

张志平 著

# 情感的本质与意义

Qinggan De Benzhi Yu Yiyi

舍勒的情感现象学概论

Shele De  
Qinggan  
Xianxiangxue Gailun

张志平 著

# 情感的本质与意义

舍勒的情感现象学概论

Qinggan De Benzhi Yu Yì

Scheler's

Qinggan

Xinxianxue Gailun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感的本质与意义：舍勒的情感现象学概论/张志平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ISBN 7-208-05967-5

I. 情… II. 张… III. 舍勒, M. (1874~1928)—情感—现象学—研究 IV. ①B516.59 ②B84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8937 号

责任编辑 杨承纮

封面装帧 苏 倩

美术编辑 甘晓培

## 情感的本质与意义

——舍勒的情感现象学概论

张志平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插页 4 字数 207,000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250

ISBN 7-208-05967-5/B·495

定价 22.00 元

# 序 言

刘放桐

张志平博士的书稿《情感的本质与意义——舍勒的情感现象学概论》即将正式出版。对他个人来说，无疑是迈出了学术旅途中重要的一步；对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特别是现象学研究来说，也算得上是添加了一项很有意义的新成果，这两方面都是值得庆贺的。张志平要我给他这部书写序。我想不妨就从这两方面说开去。

张志平的这部书稿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经过多次修订补充而最后定稿的。记得2000年他的博士论文完成后，参加通信评审和论文答辩会的专家几乎一致认为这是一篇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论文，只要在个别地方作一些修改和增补，就可以作为学术著作出版。从那以后，据我所知，这部书稿有过较早出版的机会，但张志平没有急于求成，而是一再征求和听取专家们的意见，不断进行修改，争取能精益求精。2003年时，我看到过他的一个修改稿，其中除了对舍勒本人的理论介绍更加精确、细致外，还加写了“舍勒的情感现象学与当代人的心性转型”一章，把对舍勒理论的介绍与对当代西方现实社会冲突的分析联系起来了，这就是一个重要的进步。现在看到的这部书稿在这方面又

有新的进步。这从本书第十一章及结论就可看出。人们可以不同意作者的具体分析,但对作者这种力求把当代西方哲学研究与西方现实社会的研究联系起来的努力是应当予以肯定的。本书的绝大部分篇幅仍然是用在阐释舍勒本人的学说上,这次的修订稿无论是在框架结构的合理化还是内容阐释的准确性和深刻性上同样有新的进步。导论和第一章对舍勒哲学的基本倾向及其理论的来龙去脉的分析也很是清楚明白。对这些方面,阅读这本书的读者都不难发觉,我就不在此具体介绍了。

我想在此提一下的是:像张志平这样以认真执着的态度对待毕业论文的,在博士研究生中可谓占绝大多数。他们都能认识到,高水平地完成博士论文是他们学术历程中必须迈出的步伐。这一步走得好,对他们今后的工作、特别是从事科学研究将会起很大的促进作用。因而他们在这方面从不敢掉以轻心。教育行政部门为了加强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它们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近些年的博士研究生培养中也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的负面作用的冲击下,在组织人事体制中唯学历论的消极影响下,博士学位的诱惑力使一大批活跃在官场和商场的人士也挤进了博士生的队伍。其中当然不乏原有基础较好、又认真好学之士。他们的确希望通过攻读博士学位来增长才干,更好地工作。但也有不少是依靠权力和财力混入博士生队伍的。他们当然并不离开官场和商场,而是以“在职攻博”的名义,依靠权力和财力“写成”博士论文并获得通过,“混到”博士学位,并由此而成了“学者型”的官员或企业家。在权力和财力面前,有的大学放弃了基本原则,为这些人的“混”开了方便之门。有的学校这种情况已非常严重(据说有一个大学的某一博士点一下居然招收了几十名博士生,其中多数为省市领导

干部和企业大款),在社会上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却没有听说教育行政部门对其加以严肃处理。

也许我说上面这些话有些离题了。其实这无非是表达我对包括张志平在内的绝大多数博士研究生为写好毕业论文付出的艰辛的同情和对那些依靠不正当手段来骗取学术光环的人的厌恶。

还是回来谈张志平这部书稿。记得张志平把舍勒的情感现象学作为他的博士论文的选题时,我曾有过几分疑虑。不是因为这个题目没有意义,而是觉得它的难度系数较大。当时国内一些专家、特别是几位从欧洲留学归来的青年学者对胡塞尔现象学已作过相当深入的研究,出版过一些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论著。其中有的论著提到了舍勒。也有学者出版过关于舍勒的专著。不过这些著作大都只是把舍勒当作哲学人类学的主要代表来介绍。对他的情感现象学虽也提及,却大多语焉不详。这可能是由于作者偏爱舍勒的哲学人类学部分,对他的情感现象学的重要性并未作高度评价,也可能是由于研究舍勒的情感现象学难度较大,除了需要懂得现象学外,还需要懂得宗教、心理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只谈他的哲学人类学相对说简单一些。因此,我对张志平选择这样的难题多少有点放心不下。但张志平凭着顽强努力还是把这个难题啃下来了,而且相当成功。尽管不应夸大其词地说他填补了我国学界对舍勒情感现象学研究的空白,但可以说他对这方面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张志平的这部书稿从 2000 年的初稿到现在的定稿我都看过。我上面的话只是原则肯定,并未涉及其中的具体内容。我想让读者知道的也只是张志平为这部书稿做出的努力。具体如何估计其是非成败,当然只能由专家和读者们去作结论。

据我所知,张志平在山东大学作硕士生时就已参加了山大

教师组织的科研项目。但他个人单独的著作大概是由这部《情感的本质与意义——舍勒的情感现象学概论》开始的。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我相信他以后会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 目 录

<b>导论</b>	1
<b>第一章 舍勒的思想资源</b>	24
一 基督教思想	24
二 生命哲学	32
三 现象学	43
<b>第二章 情感、价值与位格</b>	59
一 情感	59
二 价值	66
三 位格	82
<b>第三章 爱的优先地位及其秩序</b>	92
一 爱的优先地位	93
二 爱的秩序	100
<b>第四章 同情现象的差异</b>	116
一 他者之我与原初的心理之流	117
二 同情的形式与本质	121
三 情感一体与文化类型	127
<b>第五章 怨恨与价值判断</b>	132
一 怨恨的本质与功能	133

---

二	怨恨与基督教道德	141
三	怨恨与现代伦理道德	145
四	现代人价值意识的扭曲	149
<b>第六章</b>	<b>羞和羞感的现象学</b>	<b>156</b>
一	“羞”的本质及意义	157
二	“性羞感”及其功能	166
<b>第七章</b>	<b>悔悟与新生</b>	<b>175</b>
一	悔悟的本质、意义和根源	176
二	悔悟与德性的进步	186
<b>第八章</b>	<b>悲剧与价值的毁灭</b>	<b>190</b>
一	悲剧的构成条件	191
二	悲剧中价值毁灭的不可避免性	197
<b>第九章</b>	<b>受苦的意义</b>	<b>202</b>
一	受苦现象的本质	203
二	历史上的受苦方式批判	209
三	受苦与文明的发展	215
<b>第十章</b>	<b>信仰与宗教行为</b>	<b>220</b>
一	神性存在的基本特征	222
二	宗教行为	226
三	上帝的存在问题	233
四	没有人能够避免宗教行为	238
五	基督教与当今世界	241
<b>第十一章</b>	<b>当代人价值意识的转变</b>	<b>250</b>
一	制度意识与制度交往	250
二	价值的数量化及其后果	254
三	他是什么和他是谁	261
四	没有英雄只有偶像的时代	265

---

五 怨恨与恐怖主义的根源.....	268
结语 当今世界的脆弱与坚强.....	273
参考文献 .....	277

# 导 论

---

在 20 世纪的西方思想界,马克斯·舍勒 (Max Scheler, 1874—1928) 可谓是一位思想的奇才,因为他曾就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神学、美学、人类学、知识社会学等领域的问题写了大量的论著,对现象学在各门学科中的应用以及现象学本身在欧洲大陆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也作出了显著贡献。这也难怪很多 20 世纪颇有影响的思想家,如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蒂利希、韦伯、特洛尔奇 (E. Troeltsch) 等人,都对舍勒推崇备至。但就是这样一位颇负盛名的思想家,却落得一个生前辉煌死后寂寞的命运。这是因为,在舍勒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几乎遗忘了他的思想。研究舍勒的专家、美国学者弗林斯 (Manfred S. Frings) 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舍勒具有犹太血统,所以,二战期间他的著作也被德国纳粹列为禁书;二是由于二战后出版经费短缺,舍勒全集的出版工作进展得非常缓慢<sup>[1]</sup>。由于无法读到舍勒的著作,人们自然而然就把研究的目光投向此时在思想界的声誉正如日中天的其他一些思想家如胡

---

[1] Manfred S. Frings, *The Mind of Max Scheler*, p. 181.

塞尔、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等人的身上，而舍勒的思想被忽视也就在情理之中。如今，随着舍勒著作全集的问世，这种状况才逐渐有所改观：不仅舍勒的著作被译介成了英、法、意、西、俄、日、韩、汉等多种文字，而且许多学者也开始从不同角度对其思想进行研究。

作为才思敏锐、兴趣广泛的思想家，舍勒的思想是和他的时代及人生体验分不开的。因此，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他的思想，我们在此要首先介绍他那充满爱和痛苦的一生。

1874年8月22日，舍勒出生在德国慕尼黑市的一个充满宗教气息的家庭。他的父亲叫戈特利布·舍勒(Gottlieb Seheler, 1831—1900)，出生在德国法兰克福地区的一个新教家庭，曾管理过巴伐利亚王室在匈牙利的地产；他的母亲叫索菲戈玻·富尔特(Sofiegeb Fuerther, 1844—1915)，出生在富裕的犹太家庭，是一位相貌出众而且精力充沛、意志坚强的女性。在母亲的熏陶下，舍勒和他的妹妹赫丽米(Herimine)从小就深受犹太教思想的影响。不过，舍勒的母亲对他们兄妹俩并非一视同仁，她对女儿赫丽米十分刻薄，对儿子舍勒却百般娇惯。母亲的这种做法引起了舍勒的极大反感。在他看来，自己性格中的致命缺点，即过分依赖别人、不会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就是由母亲一手造成的。1903年，妹妹赫丽米与其未婚夫的不幸遇难，使舍勒遭到沉重的精神打击。他在为妹妹的不幸遇难而深感悲痛时，也为妹妹生前没有得到母爱的温暖感到难过。此后，舍勒和家人的关系就日渐疏远；1915年，他甚至连母亲的葬礼也未参加。

也许是出于对母亲的反感，舍勒对她所信奉的犹太教也逐渐感到不满。1888年，在一位女佣和一位中学教师的影响下，舍勒迷恋上了天主教，并在1899年9月20日接受了教会洗礼，成为一名正式的天主教教徒。在中学时代，舍勒对哲学和文学

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学习成绩一直都不理想。原因在于,当时的他个性不羁,不愿做个听话的学生去迎合学校的死板教育。舍勒对生物学也非常感兴趣,所以,进入大学时他首先选择的是医学专业。不过,在慕尼黑大学仅呆了一年,他就放弃了医学的学习。1895年,舍勒来到柏林大学,师从狄尔泰(W. Dilthey, 1833—1911)和西美尔(G. Simmel, 1853—1918)学习哲学和社会学。舍勒之所以转学,主要是为了他的情人阿梅丽·奥蒂莉厄(Amelie Otilie)。阿梅丽比舍勒大八岁,本来是位有夫之妇;她和舍勒于1893年在奥地利的蒂罗尔(Tirol)相识,并很快坠入情网。和丈夫离婚后,阿梅丽于1899年10月2日与舍勒结婚。婚后,他们生了两个男孩:一个不幸早夭;另一个,照舍勒的话讲,则集中了他和妻子阿梅丽的全部缺点——妻子的吝啬与歇斯底里和他的软弱与好色。由于祖母是犹太人,而自己又被当作精神病患者,舍勒和阿梅丽这个惟一幸存的儿子也在1938年至1940年间死在纳粹的集中营里<sup>[1]</sup>。

当时的柏林不仅是普鲁士的首府,也是国际化的都市。像其他工业化城市一样,柏林也存在着各种社会弊端。在柏林的贫民窟里,舍勒亲眼目睹了19世纪末这座工业城市里,人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状况,内心感到十分震惊。正是这种社会现实,激发了舍勒日后对现代精神和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批判。在柏林大学,虽然狄尔泰和西美尔这两位思想泰斗的课程让舍勒受益匪浅,但舍勒对其他课程如枯燥的逻辑分析和实证主义课程,却感到十分厌倦。于是,1896年秋,舍勒又来到耶拿大学就读。当时,耶拿的主流哲学分为两类:一类是鲁道夫·奥伊肯(Rudolf Eucken, 1846—1926)的精神生命哲学;另一类是

[1] Manfred S. Frings, *The Mind of Max Scheler*, p. 10.

奥托·李普曼(Otto Liebmann, 1840—1921)的新康德主义。舍勒主要师从奥伊肯进行研究。1897年,在奥伊肯与国民经济学教授皮尔斯道夫(Pierstorff)、地理学教授雷戈尔(Regel)的指导下,舍勒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论逻辑原理与道德原理之关系的确定》。在这篇论文中,舍勒虽然还没有从哲学上明确给出人的理念,但他日后的许多哲学思想在其中都已经露出端倪。该论文的基本论点是,作为生命存在,人是由判断力、认知力、价值感以及情感组成的混合物;道德行为不依赖于人的认识而依赖于人的情感、价值意识和生命体验;思维与意志、知与行、真与善之间的对立是不可克服的,所以,逻辑原理与道德原理是相互独立的。基于此,舍勒批判了传统理性主义伦理学把理性视为伦理学基础的观点,认为惟有情感才是引导我们道德行为的惟一指南。

完成博士论文后,舍勒去了海德堡。在那里,他一方面撰写自己的讲师资格论文《先验方法与心理方法》,另一方面又对马克斯·韦伯的思想进行深入研究<sup>[1]</sup>。受韦伯的思想影响,舍勒写作了《劳动与伦理》一书。在书中,舍勒认为,由于人的历史是有开端的,所以,人永远不可能成为道德典范;道德典范只能存在于超验领域,因此,伦理学应该在形而上学中寻找其最终基础。这个最终基础就是作为造物主的上帝。基于此,舍勒十分强调宗教自身的价值,并引用歌德的诗句为证:“人可以一无所有,但不能没有宗教。”<sup>[2]</sup>此书后来成为舍勒公开发行的第一部著作。1899年,舍勒重返耶拿,并获得在耶拿大学的任教资格。在同年的一次演讲中,舍勒主张言与行、哲学与生活应该是统一

[1] Stephen F. Schneck, *Person and Polis*, p.8.

[2] John H. Nota, *The Man and His Work*, p.25.

的。为此,他极其推崇耶稣基督,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会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此后,耶稣基督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成为舍勒宗教生活的核心,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的哲学方向。当时的耶拿大学是一所反天主教的学校,信奉天主教的学生经常和校方发生冲突。作为年轻的讲师,舍勒自己信奉天主教,也敢于挺身而出,支持信奉天主教的学生成立自己的俱乐部。在生活中,他真的做到了言行一致。

与奥伊肯的相识,对舍勒的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 19 世纪的人文科学领域,奥伊肯是一位充满了批判勇气和社会责任感的生命哲学家,他不但抨击当时充斥在德国大学讲坛上的庸俗唯物主义,为人的价值、文化、历史、宗教的存在而奔走呼号,而且还积极寻求各种文明的共同基础,以实现人类的最终统一。受奥伊肯的影响,舍勒也十分看重对人的价值、伦理、文化及历史的研究,而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潮如庸俗唯物主义、新康德主义以及心理主义等敬而远之。奥伊肯曾以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以及宗教在时间中的永恒作为自己的思想主题,舍勒终其一生也在探索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并因宗教的召唤与个人的回应之间的不一致而深感痛苦。对舍勒而言,奥伊肯恰似一位领路人,为自己指出了应当为之献身的哲学方向。

不过,在结识胡塞尔并了解他的现象学之前,舍勒的哲学天才还没有充分展露出来。这一点可从他早期思想的不成熟和缺少独创性中看出。直到遇见胡塞尔,阅读了其《逻辑研究》,舍勒的思想才有了质的飞跃。舍勒和胡塞尔的相识非常偶然。1901 年,汉斯·法伊英格尔(Hans Vaihinger)在德国哈勒(Halle)组织了一次康德思想研讨会。舍勒与胡塞尔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相识的。当时,舍勒一直对康德所谓经验直观只能是感性直观这一论断感到困惑,因为它意味着精神在直观中的作用被一笔勾销。

受生命哲学家奥伊肯、狄尔泰和柏格森的影响，舍勒逐渐摆脱康德的偏见，试图寻找精神直观或本质直观的可能性<sup>[1]</sup>。在那次会面中，当比胡塞尔年轻十五岁的舍勒向胡塞尔讲述了他崭新的“直观”概念后，胡塞尔深有同感，说他不仅与舍勒有相似的问题，而且在《逻辑研究》中已就此提出了理论上的解决办法，即“范畴直观”<sup>[2]</sup>。当时两人的住所离得很近，这为他们定期联系并花大量时间在一起讨论提供了方便<sup>[3]</sup>。在讨论过程中，舍勒一方面深受胡塞尔的影响，一方面又发展出自己独特的现象学。由于两人的个性、精神气质及问题方向存在着差异，他们对现象学的理解及运用也有很大的不同。像许多哲学家一样，舍勒明确反对胡塞尔后期思想中的先验唯心主义路线；而胡塞尔在其晚年也因两人的分歧而对舍勒十分冷淡。

在耶拿大学，舍勒最喜欢给学生上的课程有认识论、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他称自己为有神论者和实在论者(a theist and realist)，并把奥古斯丁、帕斯卡尔视为自己的导师。正当事业一帆风顺时，舍勒的个人生活却发生了变故。舍勒的妻子阿梅丽因怀疑舍勒和一位出版商的女儿私通，而在一次宴会上对后者大打出手。这件事在学校造成了很坏影响，也使舍勒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迫于外界舆论的压力，舍勒不得不离开他所喜欢的耶拿大学去寻求新的生活。

1906年，经胡塞尔推荐，舍勒回到他故乡的慕尼黑大学担任编外讲师，并成为现象学家特奥多尔·利普斯(Theodor Lipps)的一名助手。舍勒极为欣赏同事和学生中的哲学氛围，而他自

[1] Stephen F. Schneck, *Person and Polis*, p.9.

[2] John H. Nota, *The Man and His Work*, p.181.

[3] 同上, p. 14。

己的个性与哲学才华也给很多同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在慕尼黑大学还不到两年，舍勒就又一次坠入了爱河。他和一位考古学家的女儿玛莉特·富特文勒(Märit Furtwängler)一见钟情，这使他和阿梅丽本来已出现裂痕的婚姻变得岌岌可危。1908年，为了摆脱痛苦的婚姻，舍勒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为了报复，阿梅丽向报界的一位编辑宣称，舍勒为养活自己的情人不惜债台高筑，甚至向学生借钱，而她和孩子却不名分文、艰难度日。这件事在学校里弄得沸沸扬扬，致使校方于1910年解雇了舍勒，并取消他在德国所有大学里的任教资格。校方解雇舍勒的理由是：他对婚姻的背叛有悖于天主教教义，也使他不足以人师表。

被解雇后，由于没有工作，舍勒的生活一下子失去了着落，常常要靠朋友帮助才能找到暂时的栖身之所。为了谋生，他一方面四处找工作，另一方面也坚持写作，靠出版商预付的微薄稿酬艰难度日。有时，他也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去各地进行演讲。舍勒先是去了哥廷根，后又去了柏林。在哥廷根，他结识了许多年轻的现象学家，其中包括福·希尔德布兰特(Von Hildebrand)、阿道夫·赖纳赫(Adolf Reinach)以及罗曼·茨伽德(Roman Zngarden)等人<sup>[1]</sup>。在柏林，舍勒还积极参与该市的文化生活。在与当地的文学和政治团体接触的过程中，他结识了一些犹太作家及和平主义者，其中就有著名的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舍勒在各地的演讲非常成功，经常会吸引一大批听众前来聆听。胡塞尔的第一位女助手埃迪特·施泰因(Edith Stein)就是受他的影响才皈依了天主教<sup>[2]</sup>。施泰因被舍勒的个性和

[1] Stephen F. Schneek, *Person and Polis*, p.9.

[2] 由于是犹太人，Edith Stein于1942年惨死在德国的纳粹集中营中。参见，《The Mind of Max Scheler》，p.10。